

景凯旋 著

被贬低的思想

景凯旋 著

被贬低的思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贬低的思想/景凯旋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495 - 2312 - 2

I. ①被… II. ①景…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D66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276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编辑:魏 东
责任编辑:刘 丹 魏 东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3/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4.5 字数:280千字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自序

收入本文集的这些文章和评论，是我自 80 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文字。由于生性比较懒散，还有点虚无，我对出书一直都是无可无不可。古人所说的立言可以不朽，我是不相信的。记得曾经在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徜徉，放眼层层叠叠的书库，满纸沧桑的图书，突然觉得，若要在这书海中加进自己的名字，实在是一种多余。在这个大众写作的时代，古人所追求的疏离已经是一种很珍稀的品质了。

我写作是由于读书时漫溢出来的一些感想。在这些文章中，我谈及了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也谈及了一些当代的文化现象，但我意识到，这本文集不能算作地道的学术研究，主旨不够系统，论述也不够深入，像是一种散漫的随笔。与其说是在评论一些文学现象，不如说是想要表达自己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以赛亚·伯林曾根据古希腊的一首残

诗，将思想家、文学家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类，刺猬有一个中心思想，而狐狸则对许多思想均感兴趣。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每个作者都会根据自己的才性和兴趣去做研究。我将自己归为狐狸型，喜欢东嗅嗅，西瞅瞅，往往得到一个结论即抽身离去。当然，我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只小狐狸——如果不是过于自负的话。

但这些文章也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在意识到生命悲剧的前提下，追寻什么是自由的问题。谈论的对象有鲁迅、巴金、胡适、昆德拉、克里玛、米沃什、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文革”、红色戏剧与极权美学，以及中国与东欧的知识群体等。这些问题意识都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涉及当代人的存在困境。我经历过“文革”，目睹过迫害者的狂热和被迫害者的恐惧。这段经历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我的思想胎记。人与禽兽的不同，就在于人会为了某种观念去迫害他人。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去思考它，研究它，并尽力作出自己的回答。

这就是我一直对苏联、东欧文学具有特别兴趣的原因，相同的制度构成了罗素所说的同一个文化圈，从那些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主题、场景和细节中，可以看到某种“家族的相似性”。在这个多极而又单元的时代，这样的文化比较或许更有意义。无论是涉及外国文学，还是涉及中国文学，我极力想要探明的是，极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此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80年代的读书思考，主要是存在主义文学。在个人安身立命方面，我仍然认为它是有启发的，毕竟我们每个人并不是为了改变社会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充满焦虑与挣扎。但文学所揭示的人生悲剧感和荒诞感不能代替对社会的总体认识，这也是那些伟大作家的思想矛盾，感性的深刻反而构成了他们的局限，他们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言论往往是违背常识的，甚至是独断的。90年代以后，我开始接触政治自由主义，随着传统文化的重振旗鼓，又开始重新认识文化保守主义，并从

浪漫主义文学观转向政治文化解读。中外文学的相互参照，多元价值的往复审视，使我得以从一种新的角度和视野去看待文学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就是我内心仍然保持了文学本体论对权力的憎恶，而不是自由主义对权力的警惕。

对于过去的部分文字，我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不是由于观点的改变，而是由于我的怀疑主义。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就一定是真确的，所谓真理都是无数个侧面的组合，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观点，而且都可能有他的充足理由。在人类对世界的各种看法上，我只相信两句箴言是颠扑不破的。一句是康德的话：“人是一根扭曲的木材，从中长不出笔直的东西来。”另一句是弥尔顿的话，他说真理曾随着主一度降临世界，当主升天后，人类便四处寻找真理的碎片，想把它全部拼凑起来，但“我们还没有全部找到，在主再次降临以前，也不可能全部找到”。这两句箴言说出了人类认识的永恒局限，无论谁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就会不由得喜欢一种专制的抒情态度，使真理变得可怕起来。

在我看来，真理往往更是一种态度。所以我试图采用理性、平实的文字，并尽力在议论中融入个人体验和知识学背景，体现出自己的阐释风格。这样做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为了说服自己。

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魏东编辑，他热忱地为这本集子提供出版机会，让它能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占据一个角落，等待着读者的眼光。时间会消蚀一切，此书的命运也将如此。萦绕在我心头的始终是一位古希腊诗人的诗句：

“那西沉的永远是同一颗太阳。”

目 录

I

- 常识的立场 / 3
- “分子”与人 / 10
- 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 / 23
- 何谓“知识分子” / 40
- 传奇的年代 / 55
- 被贬低的思想 / 71
- 毫无目的的残酷 / 84
- 巴金的真话 / 92
-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 100
- 迷人的美学 / 113
- 对家族的想象 / 129
- 向生而在 / 140

II

昆德拉的《玩笑》 / 155

《为了告别的聚会》 / 163

一个诗人的肖像

——《生活在别处》译后记 / 168

关于“刻奇” / 177

昆德拉：反抗崇高 / 189

昆德拉与我们 / 199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 215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错？ / 224

没有死过，但病过 / 239

萨米亚特：见证自由的文学 / 250

浮出水面 / 260

重寻真理之源

——捷克萨米亚特哲学思想简论 / 270

III

悲怆的俄罗斯良心 / 283

人靠什么战胜恐惧 / 293

俄罗斯的雅努斯神 / 303

诗人的洞见 / 315

拒绝遗忘 / 327

托马斯·曼的转向 / 339

另一种东方主义 / 351

人类是一个整体 / 364

I

常识的立场

“分子”与人

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

何谓“知识分子”

传奇的年代

被贬低的思想

毫无目的的残酷

巴金的真话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迷人的美学

对家族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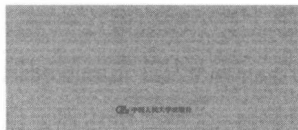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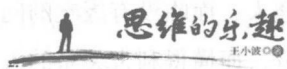
向生而在



常识的立场

中国当代思潮的流行和转移，常常是缘于一些专家学者对西方各种时髦学说的宣扬。与二十多年前无书可读的情形相比，时下的知识多得目不暇接，而且转瞬就已过时，令人感到知识的不能承受之重。知识一旦成为信息，就如同自然山水变成了旅游景点，看到的不再是风景，而是络绎于途的游人和垃圾。因此现在出了一个王小波，沉静地守着某种知识，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信念而不是资本，这使人们趋时的心感到某种清新。

王小波的力量在于他拥有一个常识的立场。渊博的学者指



《思维的樂趣》封面

出他的思想来自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这也许是对的，但他的文字更像是表达了某些常识，而不是某种主义。在本质上他不是个诗人而是小说家，这可以从他不唱高调，比如不喜欢崇高或激情之类中发现。他关注的是现实生活本身，对于时下的一些理论和主张，他都把它纳入常识的范畴中来观察，这使得他的随笔具有一种简洁明白的效果。所谓常识，不过就是明白日常事理的能力，顺任自然和习俗，大至民族历史，小至个人经历，都可以拿来作思想的参照。

人类精神的成长，其实是很缓慢的，根本的东西就那么一些，例如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等。现代人弄出许多博大精深的学说，实质上并没有给人类精神增加什么新的含量。何况先哲的言论原本也都是出自常识，只是后来由于文化的积淀，它们才变成了知识权威。所以面对复杂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学说，往往倒是平常的心智来得可靠。王小波喜欢在书中叙述许多个人故事，就因为倘若离开了寻常经验和常识的描述，任何学说都可能成为谎言。

服从常识往往能使人通情达理，因为它总是直接洞悉事物的真实。鲁迅先生说过：“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常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直接的方式，其精髓在于自然，而一个不能靠常识作出判断的人，通俗的说法是没头脑。在王小波眼里，他的姥姥是个有头脑的人，她在“大跃进”时期不相信一亩地会产三十万斤粮食，因为这不合常识。尤其她还是一个普通人，面临没有饭吃的问题，因此她的常识中还包含着利害的成分，而懂得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懂得事理，已经没有饭吃还说形势大好，就不是承认事理，而是顺从思想。其实常识正是思想的底子，王小波明白这一点，对于应不应该抢救被洪水冲走的国家财产，他认为首先应问问值不值得，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是通情达理，也是真实不欺。

服从常识还意味着使用简洁明白的话语，让思想的表达举重若轻。朴素的语言也能说出真理，而且说得更好。这方面，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的文章总是明白易晓，与人沟通。如果一个明白的道理，却非要表达得很复杂，做出很有学识很有思想的样子，其结果往往是显得举轻若重。王小波曾谈到一个生产队长，在常识领域中他十分聪明，而且有趣，但他偏想要有思想，说点“文革”时代的时髦话语，结果很闹了些笑话。那个队长恰恰忘记了，一句蕴含着生活经验的话语也许比任何迷人的理论都更有价值。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失去常识的年代，“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就是全民对常识的恢复，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小岗村村民的大包干，其实全都是常识。后代的人将不会明白，这样的言行当初竟然能使全民激动不已，他们更不会明白，为了这些常识中国人曾付出了几十年的苦难代价。我们的社会不缺乏理论，缺乏的是常识，像王小波姥姥那样的常识。在生活中，任何伟大的思想并不比一位老农的看法对人们更有益。如最近的报纸所透露的，50年代末的科学家们还曾奉最高指示，开展“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研课题，要将吃不完的粮食转化成有机化工原料，而当时的状况早已是哀鸿遍野了。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习惯于寻求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性理论，用某种思想或主义来对现实进行解释，而不管生活本身是不是这样。

这里奉行的是格勒定律：如果事实和理论不一致，这事实就必须被抹去。

造成20世纪灾难的这种思维定势今天仍在延续，看不出有多少改变。许多人不明事理，却喜欢高谈思想，谈学说。比如：二十几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悲剧，一代人的读书、工作和婚姻都被耽搁了，如今他们中大多数人又面临着下

岗，承受着家庭生活的重负。但有些人却以一种精神被虐狂的心理宣称“青春无悔”。据说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然而，什么时候黄土高原变成了鲜花盛开的原野？无望的生活变成了田园牧歌？辩证的理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人们痛苦的经历？

对于当前的集体腐败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一面是有人在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资产，一面是让严肃的思考脱离现实的轨道，而无论是理论界提倡给改革引入人文关怀，还是认为腐败是由于过去制度难以为继的体现，其实都是言不及义，因为它们都没有指出权力体制导致腐败的作用。从本质上讲，正是由于造成过去灾难的那种权力关系仍然在起着作用，在权力制约方面并没有质的改变，腐败才得以大量产生，如果要追根溯源，那么，具有当代特征的腐败其实从“文革”后期利用权力关系“走后门”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稍有一点常识和记忆就可以弄明白的。但许多人不能明白，很多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让判断停留在常识中就行了，如果不具备真诚与思考的素质，追求理论的结果往往会败坏人们的正常理解力。

思想出于持续的恐惧，这是 20 世纪人类经验的核心。在王小波的思想背景中总有着过去年代的威胁。他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他对事物的理解，大多也是源于那个年代，告诉人们不要相信什么，而不是像有些人总喜欢叫人们相信什么，所以他的常识是一种“反思的常识”。他所反对的都是过

去几十年的东西，以及从过去延续下来的那部分现在。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所反对的物欲横流，他并不特别关注，他关注的是过去年代幽灵的复活，那些试图改造人们思想的



王小波像

倾向，还有信仰的滥用，比如90年代中期的“重建精神家园”、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等等。的确，与过去的“突出政治”、“反帝反修”相比，当代的精神迷恋实难说取得了多少历史进步。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后，仍然有人对全民的一统世界观感兴趣，这恰好说明，只要过去的许多事情没有说清楚，没有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任何历史就都是当代史。

这似乎是80年代启蒙的主题，其实正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基本问题，不应该越过这个基本问题去探讨理论，否则就是对着风车挥舞旗帜。非洲饥民、前南地区、高加索当然是人类的悲剧，西方社会物质主义的危机我们也从小就被告知，但这些都不是属于相同社会的同一层次的问题，人们无法对某一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保持恒久的关心，这是人的能力所限。且不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西方社会的缺乏常识（如认为他们不重视家庭生活）一如西方知识分子曾经对我们的看法缺乏常识一样（如有的西方学者就曾把我们的自我批评看成是一个美好社会纯洁心灵的体现），但西方知识分子毕竟是出于对自身境遇的反抗，可我们则是为了什么？说到底，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才更加迫切，倒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然而，在每天大量制造的文字中，我们却绝口不提那些真正的问题，以及问题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即使没有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的写作，也早已是人们私下谈论的常识了。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南非作家戈迪默所说的那种“基本姿态”，即真实面对自己生存的境遇，并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将它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终极目的关怀掩盖不住他们对基本问题的逃避。人们目力所及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文章，操着同一种言说方式，例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一大堆时髦空洞的词语——荒诞、焦虑、忧患、颠覆、建构、预设等等。90年代以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新的报

刊文章腔，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些二三流中外教授学者制造的各种理论流派，满心以为那些貌似高深的概念中包含了比千百年的常识更多的真理。这种现象可以称作一种“大词崇拜”，拼命转弄着概念的魔方，可就是不通情达理，与现实相去甚远。读这样的文章，你会觉得它们全都是在举轻若重，就像王小波喜欢引用的那则拉封丹寓言所说，大山临盆，天崩地裂，生出的是一只耗子。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18世纪孟德斯鸠论亚洲的一句话：“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

积久会成习，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方法的学习，好像就只学会了“人类的眼光”，却没有学会多少常识的眼光。而一个民族正是靠着常识生活过来的。鲁迅先生30年代在上海，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当代文化思想界的热闹背后，其实是荒芜，从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到谈论各种思想的学术随笔，正是鲁迅所说的“身边”和“天边”的文字。这样的枝头上显然是结不出任何果子的，只有那些注意“两者之间的一圈”的人，才有可能接近真理的地界。

一般来说，常识或经验的东西被认为表现了心灵的局限，不能达到深刻的境界，但几十年来更沉重的教训却是，做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易，而承认眼见的现实，做一个明白人则更难。直接的经验常识往往可以戳穿谎言，照亮被思想蒙蔽的心灵。1975年夏天，我在川东一个县城实习，那时候正在开展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广播里终日宣传着革命的大好形势，对现状我虽不十分认真，但也谈不上怀疑，出于多年来思想培养的潜在影响，我完全可以自我安慰，也许每天看到的现象并不是本质和主流。相比之下，我当时倒是更喜欢跟朋友讨论那些世界大事。我们的政治